

史可法与安庆

张梦驰 文/图



“宜城天堑”石碑复制件

明末著名抗清将领、民族英雄史可法，其事迹广为世人熟知。他曾于安庆为官履职，与这座城市结下了深厚渊源。在安庆地区的府志、县志等地方文献资料中，留存有与其相关的记载，本文结合三通碑刻(拓片)实物史料，梳理介绍史可法与安庆的历史交集。

史可法(1602—1645)，字宪之，号道邻，大兴籍，祥符(今开封市)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历任西安府推官、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官至南明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清兵入关后，督师扬州，率扬州军民抗击清军，后因拒不接受劝降战死扬州。南明隆武帝封谥“忠靖”，清乾隆帝追谥“忠正”。

一、史可法在安庆任职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底层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值此乱世之际，梳理史可法的生平履历发现，史可法一生仕途多在平定各地战乱、安抚地方的军务中度过，在安庆任职的四年，也主要是镇压农民起义军。经查阅民国时期杨德恩所著《史可法年谱》可知，史可法于崇祯八年(1635)迁江西右参议，后出任安池守备道，监江北诸军。崇祯十年(1637)七月，史可法擢右金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及河南等地。崇祯十二年(1639)夏，丁外艰去。

史可法刚到任安池守备道三天，就穿上盔甲前往一线与张献忠、罗汝才两股农民起义军作战。康熙《安庆府志》有记载：(崇祯八年)乙亥任安池道，下车甫三日，流贼献、曹诸营犯太湖、宿松至潜山，可法即毅然擐甲，直前簿之。

史可法在安庆期间，积极整饬军政，统兵转战各地，阻击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屡屡挫敌锋芒；同时修筑城防，在集贤门外建造天堑楼，在宿松建造城池等。史可法在军中作战时，与士兵同甘苦，身先士卒，赏罚分明，爱民敬士，离开安庆时百姓赤脚奔走、痛哭流涕，《安庆府志》记载：“皖人括蹠奔泣，如失怙恃。”足见其深得民心。

二、与史可法相关的三通碑刻

目前发现的与史可法相关的碑刻共有三通，分别是“宜城天堑”“戒徇绸桑”“最上一乘”，下面结合相关史料记载对三通碑刻逐一介绍。

“宜城天堑”石碑

安庆博物馆安庆城市记忆展厅悬挂有“宜城天堑”石碑拓片复制件。此碑正文为楷书“宜城天堑”四字，字体浑厚沉稳，端庄刚劲，具有庙堂之气。正文右侧六行小字依次为“钦差整饬安池等处监军兵备兼

理钱粮驿传江西”“布政使司右参议兼提刑按察司史可法”“直隶安庆府知府皮应举”“同知康良献”“通判□□□(据推断应是‘唐良棐’)”“推官薛之垣”。正文左侧两行小字依次为“怀宁县知县黄配玄”“皇明崇祯玖年正月吉旦立”。

“宜城”一词源于东晋文学家、堪舆学家郭璞登临盛唐山时有感而发“此地宜城”，后多代指“安庆”，天堑是指天然形成的阻隔交通的沟。宜城天堑的大概意思是通过建设城楼并依仗长江天险拱卫安庆城，希冀城池能坚如磐石、固若金汤。

关于此碑的设立缘由，是为了防范流寇而建立。康熙《安庆府志》卷十三“公署”有其详细记载：“前楼在集贤门外，明崇祯九年兵备道史可法、知府皮应举因防流寇特建。如城门制，上为高楼，下为圆门，悬石额，向北曰‘宜城天堑’，向南曰‘磐石万年’，楼下西偏立关圣庙，楼上置炮石，史、皮二公日夕枕戈防御，皖境得安。”

民国时期徐乃昌在其主纂的《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一书中收录了此碑，并载有碑的内容、尺寸及当时所在地的信息，据其记载：“宜城天堑四大字，在怀宁县菱湖公园(今安庆市区菱湖公园)。拓本高一尺四寸六分，广六尺，宜城天堑四字平列，字径一尺一寸，题名前六行，后二行，行字不等，均正书。”此碑自前楼流转至菱湖公园内，怀宁人舒鸿贻曾作《史阁部碑亭记》记述此事，后因时局动荡变迁，原碑不知所踪。

“戒徇绸桑”石碑

“戒徇绸桑”石碑，碑长110厘米，宽40厘米。石碑正文为楷书双钩“戒徇绸桑”，正文右侧五行小字依次为“□□(此处损毁应为‘钦差’)整饬安池等处监军道史可法”“安庆府知府皮应举”“同知康良献”“通判唐良棐”“推官薛之垣”。正文左侧两行小字依次为“怀宁县知县黄配玄”“崇祯玖年孟夏月吉旦立”。

“戒徇绸桑”一词中，“戒徇”出自《易经》第六十三卦既济卦爻辞“濡有衣袽，终日戒”。大概意思是乘船济水，船上需要预备衣袽，一旦出现渗漏，用其堵塞。“绸桑”出自《诗经·豳风·鸛鸣》：“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繆牖户。”大概意思是趁着天还没有下雨，啄取桑根，牢牢缚紧门窗，防范未来的风雨。时值各地战乱四起、烽烟不断，此碑旨在告诫官民需要提高警惕，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积极采取防御措施，防患于未然。

此碑立碑时间和“宜城天堑”立碑时间相差了三个月，上下款仅史可法职务表述有繁简差异，由此推断“宜城天堑”中缺失的通判姓名应是“唐良棐”。《怀宁县志》卷十三职官表对此人有记载：唐良棐，浙江乌程举人。

此碑的发现与出土，据章安庆《〈戒徇绸桑〉碑的出土与捐献》一文记载：“1985年11月8日下午3时，三弟章惠在古城安庆大南门防洪墙缺口处坝基下两米深处挖掘出一块明代碑刻”。此碑即“戒徇绸桑”石碑，经章氏兄弟反复考证后，认为此碑尤为珍贵，便将此碑捐赠并入藏于安庆博物馆。

“最上一乘”石刻

白崖寨又名白牙寨、云崖堡，白崖寨峰峦突起，寨垒高悬，奇山怪石遍布寨墙内外。寨墙均系青条石筑垒，高3米，厚1米，险要地段呈双层寨围，内低外高，易守难攻，周长4公里，环绕东峰、中峰、西阳尖、雁峦坡、大印坡5个山峰，巍峨壮观，宛如长城，有“南国小长城”之称，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崖寨系元末义民吴士杰为御寇率众所建，由于地势险要，寨前狭窄，易守难攻，为历代兵家对垒必争之地。

崇祯十年(1637年)，史可法踞寨与张献忠的起义军作战，史可法被围困寨中，张献忠部久攻不下。史可法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写下了一副慷慨悲壮的对联：“听涧底泉声，呼天地是歌是泣；看阶前月色，问英雄还死还生。”据民间传说，史可法被围困，准备以身殉国之际，在白崖寨云禅寺高僧云崖禅师的指点下，由左良玉搬来救兵，又得乡民协助，将张献忠部下猛将闯塌天杀死在白崖寨下，史可法转败为胜，事后史可法登上西营峰犒军，亲手题写“最上一乘”四字，刻在纪功石上面。民国时期《宿松县志》记载：纪功石在县北五十里白崖砦，明巡抚史可法勒有“最上一乘”四字。如今到白崖寨还能看到史公留下的“最上一乘”四字。

三、安庆府县志中史可法遗文

除三通碑刻外，安庆地区的府志、县志还留存有关于史可法的珍贵文献。史可法的奏疏、书牋、家书等被后世整理编撰成书，收录较全的应是罗振常校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史可法集》，然仍有遗漏之处。安庆学者江贻隆在《安庆府县志中史可法遗文四篇及写作时间考证》一文中写道，检寻清代至民国安庆一府六邑所有方志，为《史可法集》补遗四篇，其中一篇为奏疏，三篇为书牋，题目一如方志，即《请建宿松城疏》《报邑令杨云梯书》《又报杨令书》和《再与周澡一书》。其中值得一提的，《请建宿松城疏》是现今所能见到的史可法的第一篇奏疏，该疏结合时局分析了建城池的必要性，“安庆为留都咽喉，宿松为安庆门户，无安庆是无留都也，



“最上一乘”石刻

无宿松是无安庆也。”据江贻隆查阅史料考证该疏应写于崇祯九年(1636)，同时佐证了宿松自西汉建治，旧无城池。与前文中提到的“宜城天堑”石碑和“戒徇绸桑”石碑写于同一年。

四、史可法与左光斗、刘若宰

史可法与安庆的深厚渊源，远不止这三通碑刻，史可法的恩师左光斗和仕途上的贵人刘若宰都是安庆人。

左光斗(1572—1625)，字遗直，一字共之，又字苍屿，号浮丘，谥号忠毅，安庆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师生相遇于京城古寺，左光斗欣赏史可法的文章，童子试后请史可法到家中与其子侄们一同学习。左光斗因弹劾魏忠贤阉党，被诬陷下狱，受尽酷刑。史可法不顾个人安危，冒死潜入狱中探望。后来左光斗被阉党害死。崇祯八年(1635)十一月，史可法任安池守备道后，前往皖山祭祀恩师，写下了《祭大中丞左公文》以记之。史可法继承其师气节风骨，为国尽忠，在扬州破城后，宁死不屈，为国殉难。

史可法能升任巡抚，一方面是其显著的政绩，一方面也得益于刘若宰的大力举荐。刘若宰(1595—1640)，字胤平，号退斋。刘尚志子。崇祯元年(1628)戊辰科状元。授谕德职，充任日讲官。史可法与刘若宰是同科进士，是三甲二十六名。刘若宰评价史可法“智勇中介，具经纬才”特向皇帝推荐，皇帝“嘉纳”，予以拔擢，崇祯十年(1637)升任皖抚。康熙《安庆府志》卷十记载：“安池道史可法智勇忠介，具经纬才，特推毂为皖抚。”

岁月流转，山河更迭，碑石虽有沧桑、旧迹几经变迁，但史可法忠于社稷、爱民恤民、临危不惧的崇高品格，早已沉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融入在安庆的脉络中，让后人在金石方志与历史遗存中，寻找这位忠义名臣与安庆的不朽情缘。